

##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有关《儒藏》工程的讲话摘要

2009年9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现将其中关于《儒藏》工程的部分摘要如下：

汤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对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典籍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被誉为“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已整理出版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有学者评论说：有这么多的学者甘坐冷板凳，甘于清贫，投身于《儒藏》这一伟大的工程，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精神，也是一种境界，这会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留下印迹。

（徐昭越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 编纂《儒藏》 传承文明

——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汤一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好！

值此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很高兴代表《儒藏》工程的参与者出席这次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并借此机会向教育部领导及各位来宾汇报《儒藏》工程的情况。

### 一、《儒藏》工程的意义

《儒藏》工程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其目标是要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并像《佛藏》、《道藏》那样，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儒藏》工程得以在教育部立项，是我们国家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建设上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明、清两朝都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但都未能实行。现在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适时编纂《儒藏》，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儒学研究。在新世纪，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在儒家文化中就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并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批判地继承这笔文化遗产，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 二、《儒藏》工程的构想

《儒藏》工程由编纂与研究两部分构成，它既要要对儒学文献作全面的整理，又要对儒家文化作系统的研究。编纂部分又分两步进行，先编“精华编”，再编“大本”。经研究论证，《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400余种。另外，收录历史上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地区——韩国、

日本、越南等国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著作 100 余种。《儒藏》精华编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这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儒藏》精华编按传统的四部分类，经简明校勘、标点，以繁体、竖排的方式排印，这既可避免与近年来影印的一系列大型古籍丛书重复，又便于阅读及制作成电子文本，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的需要。《儒藏》大本还将进一步收录 5000 余种、约 15 亿字的儒学文献。

### 三、《儒藏》工程的实施及经验

《儒藏》工程规模浩大，非北京大学一家所能独自承担，教育部要求北京大学“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此，我们与合作单位一道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

首先，我们在整合北大人文学科力量（包括文史哲、图书馆、东方学）的基础上，陆续邀集了海内外 30 多家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400 多位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并根据《儒藏》各部类的特点及各单位的专长进行分工，组织联合攻关。

其次，我们按照总的学术目标，陆续制订出《〈儒藏〉精华编凡例》、《〈儒藏〉精华编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等文件，并印制成《〈儒藏〉工程工作手册》，以统一编纂体例，规范质量标准。

第三，我们每年都召开学术及行政工作会议研究问题、协调工作。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如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为《儒藏》工程提供了智力和精神支持。

第四，我们每年都走访各合作单位，与部类主编和校点者交换意见，及时解决校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第五，我们聘请了多家出版社的近 30 位资深编审，成立编审专家组，专职负责稿件的通审。专家们丰富的经验及认真的态度为保证稿件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我们大力培养新人，至今已招收 6 届博士、2 届硕士研究生，并有 3 名博士后进站，他们大多参与了编纂《儒藏》的工作。这些年轻学者已经逐渐成长为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复合型人才。其他兄弟院校也有类似的做法。《儒藏》工程促成了一批青年学术骨干的迅速成长，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第七，《儒藏》工程也是一项大型的国际合作项目，我们与韩国成均馆暨成均馆大学、日本东方学会暨二松学舍大学以及越南国立河内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我们既尊重外国同行的意见，在选目上充分体现各国儒学的特色，

同时又要求他们按照我们制订的编纂体例，统一规范。

第八，我们还逐渐摸索建立了一套编纂出版大型古籍丛书的工作流程，并注意落实重点环节。

在《儒藏》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有三点整理古籍的具体经验：第一，要慎重选择合作单位和校点者；第二，要慎重选择底本和参校本；第三，要严把审稿关。根据我们的经验，开展大型学术文化工程必须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有错必改、精益求精，一定要对得起古人和后代。

#### 四、《儒藏》工程的成果

目前，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已收到完成稿件 250 余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36 册，2000 多万字，其中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各 1 册。经专家评定，从已经出版的成果看，其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准能够媲美甚至超过前人。同时，各项儒学专题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9 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以及《儒藏总目·经部》已经完成，《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集刊已出版 1 集，“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已完成第 1 期和第 2 期招标工作。

在此，我要感谢教育部，没有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儒藏》工程便不可能有目前的规模和进展。教育部先后为《儒藏》的科研工作投入了 1000 万元，给予工程极大的资助力，这充分体现了教育部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重视。我也要感谢参与《儒藏》工程的所有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他们“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学术态度及敬业精神为学术界注入了一缕清风。我相信，有教育部的坚强领导，有各兄弟院校及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儒藏》工程必将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首批成果出版

新华网北京9月9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9日从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了解到,首批34个重大攻关项目最终成果已由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儒藏》工程首批36册图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教育部从2003年起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开始实施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每年评审立项40个,每个项目资助30万至80万元。到2008年,重大攻关项目累计设立235项,今年40个项目也在评审过程中。

作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最终成果将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图书统一出版。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说,《儒藏》工程于2003年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36册,2000多万字,其中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各一册。同时,各项儒学专题研究也正在进行中,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以及《儒藏总目·经部》已经完成。

作为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工程包括《儒藏》编纂和“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儒藏》包括《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大全。其目标是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

## 专题：《儒藏》之境

编者按：为配合预定于2009年9月召开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光明日报》国学版于2009年8月31日曾刊登题为“《儒藏》之境”的学术专版，发表一组以境外学者为主的特约文章，以评介《儒藏》工程的成果和价值。由于当时版面篇幅所限，该组文章发表时有所删改。现将该组文章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 《儒藏》工程的意义、构想及进展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 汤一介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没有中断并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而且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时代特点，批判地继承这笔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精神财富，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教育部立项、由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历史上的儒家典籍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像《佛藏》、《道藏》那样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明、清两朝都曾有学者建议编修《儒藏》，因种种原因，没能实行。现在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儒藏》编纂的完成，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成果。

《儒藏》工程由编纂与研究两部分构成，它既要全面地整理和编纂儒家典籍文献，又要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其编纂部分又分为两步进行，先编纂“《儒藏》精华编”，再编纂“《儒藏》大全本”。经研究论证，《儒藏》精华编收录

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400 余种。另外，收录历史上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地区——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著作 100 余种。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应是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儒藏》精华编采取繁体竖排标点并予简明校勘的方式排印，这既是为了避免与近年来影印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古籍丛书重复，也是为了便于利用及便于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文本，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学术研究和传承的需要。其研究部分包括：编撰 9 卷本《中国儒学史》，选译日本、韩国学者撰著的本国儒学史，联络越南学者撰著越南儒学史，编修按四部分类的《儒藏总目》，编撰“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系列专著，编辑学术集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等。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构想，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北京大学通过整合本校人文学科的力量，并联合海内外（包括韩、日、越等国）30 多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400 多位专家学者，积极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以及国际性的合作攻关。目前《儒藏》工程已逐渐建立了一套编纂和出版大型古籍丛书的规范和流程，积累了一些编纂和校勘古籍的经验和方法，培养了一批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骨干和研究生，也推动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学术文化交流。

迄今为止，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已收到海内外学者完成的稿件 250 余种，并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30 余册。经专家评定，从已出版的成果看，其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确应可媲美甚或超越前人。同时，各项儒学专题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相信随着《儒藏》工程的不断开展和最终完成，必将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 《儒藏》与新经学及文艺复兴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饶宗颐

2001年，我曾在北京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提出：若干年来，由于出土简册的丰富，未来的21世纪将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将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订我们新时代的Bible。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也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望。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学”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创辟性的文化事业，不应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工作，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经学的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成员，重新做一次总检讨。“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

经书对现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汉书·艺文志》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把《乐》列在前茅，乐以致和，所谓“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给以新的诠释。

欣闻近年来北京大学在教育部支持下，已联合海内外数十所大学和学术机构，有中、韩、日、越等国数百位学者参加，正在编纂校点排印本《儒藏》，将儒家的传世文献，包括最新的出土文献以及域外文献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同时还进行相应的儒学史及多项专题研究，这项巨大的工程必将对新经学的重建、对我国的文艺复兴作出重大贡献。为此，我特为主持其事的汤一介教授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藏添新典”，下联是“时中协太和”，以示对《儒藏》工程的支持。

## 《儒藏》的世界意义

法国科学院院士、索邦大学教授 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17 世纪，耶稣会士将儒教传入欧洲。《四书》第一个翻译文稿是 1593 年由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翻译成拉丁语的。当初的手写本，如今已经遗失。不过在 1662 年，由意大利耶稣会会士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和葡萄牙耶稣会会士郭纳爵 (Ignatius da Costa, 1599–1666) 合作用拉丁语正式译成此书并印刷出版。之后，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典籍被西方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为什么会是传教士呢？因为那个时期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只有他们在努力地理解中国文化，原因很简单：是传教布道的热忱。启蒙运动时期充满哲学氛围的欧洲在传教士之后都热衷中国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定位在宗教层面上。因此，最初的西方思想界经常提出的问题就是想了解儒教是自然神论还是无神论。比如，对于加尔文派的培尔 (Pierre Bayle, 1647 — 1706) 来说，儒教无疑是属于无神论的。而对于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 — 1716) ——这位对汉字的仰慕者而言，儒教却是属于自然神论的。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西方问题，它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基于神学的思维传统。在中国，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构建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儒教与神学没有任何关联。然而中国的理论是在长期进行占卜活动中逐渐形成，是在我称之为替代了神学的“占卜学”的古代思想中成形的。这种占卜学是在阴阳、五行和乾坤的宇宙学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思想家典籍中，后者替代了西洋思维构造的形而上学。这一传统最早的典籍是《三易》，其中前两种已经失传，第三种《周易》遂成为儒经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没有一部书像《周易》这样被阅读、研究和一再修订，《周易》就如同欧洲传统中的《圣经》一样。

正是这种以占卜学为核心的内容将中国思想置于同人类其他重要文化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印度文化、欧洲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这些文化一开始就都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在中国并不是因为宗教消亡了，相反，道教和佛教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所致。但是在儒教中，已丧失了形而上的一面，仅只保留了社会学的一面。宗教行为被缩减到一些礼仪形式上，如：祭祖、婚嫁、丧葬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时令节气。在生活中，行为举止受到礼仪规范，这是社会秩序的需要。



礼仪中的宗教含义消失，尽管有由其社会意义的增强作为补偿，但是对于充满神学思想的传教士而言，这些仍然是难以理解的。由此引发的礼仪之争，纯粹是文化差异的表现，这一差异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

因此，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在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被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上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在新的目标推动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的文化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如全球环境的破坏、富国与穷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核武器扩散、不同种族之间的地区冲突增多。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重新认识。依我之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我希望这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我要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代表西方最高汉学研究水平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是他将中国的科学思想收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儒藏》的出版或也可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将成为后现代全球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潮宗于海。

## 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出版感言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特聘讲座研究员 刘述先

最近收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寄来精华编最新出版的两册：第一〇四册，经部四书类，与第二八一册，出土文献类。重甸甸两大本，附寄小册子：《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简介》，让我警觉到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简介》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所传承的“六经”不是某种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凡例说明，精华编所收书籍，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我收到的两册刚好分属两类。第一〇四册由孙钦善、严佐之主编，第二八一册由庞朴主编。各书卷端由整理者撰写《校点说明》，简要介绍作者生平、该书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以及整理时所确定的底本、校本及其它有关情况。凑巧我收到的两册包括了《论语》在流行的朱注之前最重要的集解与注疏的本子，虽然不会影响到我多年浸淫《论语》体证的哲理，对于版本完全外行的我，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以乐于写下一些感言作为参考之用。

第一〇四册“学庸之属”只收了南宋石谿（子重）、朱熹的《中庸辑略》，与王阳明《大学古本旁注》存目。“论语之属”才是主体，共收了三部影响深远的大著：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正平版），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与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孙钦善校点《论语集解》，说明此书旧题何晏撰，实际是在何晏主持下集体编撰而成的。此书首创注释之作的“集解”体，是《论语》汉魏诸家注解的集成之作，较为集中地保存了《论语》的汉魏古注，影响很大，后世多在其基础上作疏。而完整的《论语》单集解本，在国内早已中断流传，而在日本流传的抄本，以正平版最具代表性。此次整理，以正平双跋本为底本。皇侃即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既疏正文，又疏注文，为晋、南北朝《论语》注释的集成之作。此书在中国失传已久，在日本则长期以抄本流传。一九二三年大阪怀德堂有排印本，由武内义雄据多种古抄本合校而成。此次整理即以怀德堂本为底本。另有一七五〇年印本于八〇年代曾误作高丽本回传中国，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作为校本。南宋邢昺据不同于正平版的《论语集解》作《论语注疏》。此书有蜀大字本十卷，现藏日本，附有《经典释文》，为元明以来诸本所无，弥足珍贵。这次整理，以影印本为底本，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为校本。

由此可见，为了保存儒家的典籍，竟然需要通过国际的努力才能达成目标。为了检视集解、注疏的同异，我特意挑选了颜渊第十二的第一章克己复礼为例，藉此了解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何晏集解原文：“克己复礼为仁”。马融曰：“克己，约身也。”孔安国曰：“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原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国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原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郑玄曰：“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原文：“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王肃曰：“敬事此语，必行之。”皇侃的义疏要详细得多。有关“克己复礼为仁”，他的义疏是：“克，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还反于礼中，则为仁也。于时为奢泰过礼，故云‘礼’也。一云，身能使礼返反身中，则为仁也。范宁云：‘克，责也。复礼，谓责克己失礼也。非仁者不能责己复礼，故能自责己复礼则为仁矣。’”有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义疏在孔安国解之后又引范宁云：“言为仁在我，岂俟彼为仁耶？”邢昺注疏对于马融注又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正义曰：此注克训为约，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逼，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今刊定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身【此字阮本无】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

第二八一册收了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与《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及竹书《孔子诗论》与《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五行》。这些文献出土，引起专家学者聚讼，意见不一，等到尘埃落地，古代中国哲学史势必要改写，我还在耐心等待，此处不赘。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一册也包括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依校点说明，这批竹简在一九七三年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释文》于一九九七年由河北省文物出版社出版，附有《介绍》，说明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初步认定有六百二十多枚。刘修死于公元前五十五年，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汉时为学童的启蒙读本，是必读的经书之一。西汉时除《古论》世不传外，《鲁论》、《齐论》各有所传。西汉末安昌侯张禹将两论择善而从，合而为一，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以及今本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依之，考之《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一时大为流行，现已失传。后代研究的学者从残存的《论语注》中试图辨别三论的异同，终因三者孱杂混淆，而无法认清各自的面目。竹简中的文字，差异很多，有抄错或随意简写的字，也有属于底本上文字的不同，可供学者深入研究。其书写由古文演变成了汉隶，简本也有一些《鲁论》的文字，是今本看不到的东西。但颜渊克己复礼章仅有三一一与三一二两片，并无异辞。

这一册又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郑注》于五代之际逐渐亡佚。南宋王应麟、清儒惠栋曾予辑佚，然不足原书什一。二十世纪初，敦煌、吐鲁番的古代石窟、墓葬中，

陆续出土一些《郑注》的唐人写本，使学者萌生了复原《郑注》的希望。经过多年多家的辑佚和整理，大致已有半部完整的《郑注》为我们所知了。可惜没有关于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资料。

此书最后收有唐写本《论语集解》。据校点说明，今所见何晏《集解》均为注疏本，凡二种，即“皇本”与“邢本”，均是宋以后的版本。但敦煌、吐鲁蕃出土唐人写《集解》单行本六十余件，国内外学者曾诧为稀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问题。本书所收《颜渊》篇以“伯希和二六二〇号写本”为底本，共存五十八行半，起篇题，迄篇末，首尾完整。读者如有兴趣，不妨找精华编来看。

由以上所说，可见我虽然只熟悉哲学概念，不熟悉版本学，仍然学到了有关《论语》的许多东西，所以不揣简陋，当《儒藏》总编纂汤一介教授邀请我写一篇短文介绍《儒藏》、特别是精华编的意义，我也就欣然应命，草就一篇感言与读者分享。

## 《儒藏》“日本之部”的独特价值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桥本秀美

《儒藏》“精华编”目前已出版 15 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经过数年来的实战磨炼，已经形成一个在古籍校点编辑领域里罕见其比的强大队伍。他们目前为达到今年秋季以前完成出版 36 册的目标，正在日夜奋斗中。而在这批书中，将要包括“越南之部”、“日本之部”各一册，“韩国之部”两册，格外引人注目。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周边地区也有深刻、广泛的影响。要全面了解儒学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地区的儒学著作。基于这种考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从 2005 年开始筹划扩编域外部分，并在越南、韩国、日本三国寻求合作机构，邀请三国学者直接承担编辑任务。《儒藏》中心在日本得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川芳郎先生的支持，即委托他安排一切有关事宜。户川先生在日本汉学界有极高的声望，从各种客观条件来看无疑是最佳人选。后来的事实证明《儒藏》中心的这一选择完全正确。户川先生很快取得日本东方学会的支持，建立组织严密的“《儒藏》日本编委会”，由日本古代儒学的专家讨论研究拟收书目，再动员日本各地大学的相关教研室分担校点工作。

户川先生说，要为《儒藏》编“日本之部”，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胜任。乍听似乎是夸大之词，其实是他对学术史的客观认识使他相信这一点。古代学术作为历史事实而存在，但如何认识这些事实，又属于另外一种历史问题，这一点却经常被我们忽视。据户川先生说，日本明治革命，学术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当时有一位叫井上哲次郎的学者引进西方学术方法，对日本幕府时期的儒学进行分析，提出朱子学、阳明学、古学三学派的概念，对幕府时期的重要学者进行归类。这种三分类概念被后来的学界广泛认可并且运用，因此我们如今要整理幕府时期的儒学著作，仍然要从井上哲次郎的概念出发，否则在众多学者几乎数不尽的大量现存著作面前，无从抉择。户川先生的专攻方向是汉唐思想史，但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过日本近代学术制度史，所以才能有这种认识。

时间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幕府时期，日本人撰写的著作当中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民族意识，因而明治以后的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学者们大力宣传幕府时期的日人儒学著



作。近一百年来，很多种有关日本思想史的丛书，不厌其烦地收录那些幕府时期著作，除了进行校点外，还重点探讨其中日本独特的思想。日本自古以来接受中国文化，但幕府时期的学者发展出独创性的日本本土思想，因而日本在文化上也不是中国的附庸，这是他们要强调的重点。而幕府时期的日本学者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撰述的大量著作，相对被忽略，过去的研究也很薄弱。

现在来看《儒藏》“日本之部”的选目，我们发现这是前所未有、颇有新意的一套丛书。所选著作时限均属幕府时期以及帝国主义时期，与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史重点讨论的时间范围相符。虽然如此，他们这份选目中有不少是过去日本出版的同类丛书所不见的书。此中关键在于《儒藏》只收汉语著作，不收录日文著作，因而幕府时期学者用其母语抒发自己思想的著作无从掺入，结果这份书目给人一种偏重考据学的印象。考据学自然也不免带有思想的色彩，如太宰春台撰《诗书古传》，以日本流传多种中国已逸古籍为傲，又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撰成，幕府将军下令出口到中国，希望在中国引起轰动，凡此等都无非是那种民族变态心理的表现。但撇开民族心理，专看内容，则选目中的确有不少吸引我们的书名，如《论语集解考异》、《正平本论语札记》、《宋本尔雅校讹》等校勘成果，或许能提供较多文本信息。《说文解字疏》似乎是考订之作，据说只有抄本流传，这次由《儒藏》首次整理排印。《论语征》当年传到中国，不少观点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所采录，是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学者最津津乐道的。其实《论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歪打正着的机率也就比较大。像《说文解字疏》这种著作则无法凭想象力乱写，而必须学有根基才能做好。当年日本学者真正的汉学水准到底有多高，我们可以刮目相待了。另外有一部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孝经述议》。这原本是隋代刘炫的著作，后来在中国失传，流传在日本的也没有足本。上世纪中期，林孝一先生曾花费二十年时间，从日本各地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中辑录整理，恢复原书大部分内容。这是现存唯一的隋代经学著作，在经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1953年出版之后，中国学界对此书几乎无所了解。大概因其内容本身的重大价值，又因此书不妨同时视为林先生辑佚研究的成果，故特编入《儒藏》“日本之部”。我们对此书的期望也最大。

《儒藏》“日本之部”的选目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体现编者观看日本古代儒学著作的基本态度。“日本之部”作为《儒藏》的一部分，让我们用中国传统学术的平台阅读日本古代的儒学著作，使日本古代的儒学著作真正纳入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当中，是《儒藏》这一独创体例的深层意涵。这将会改变我们对中国以及周围地区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 越南儒家典籍文献概况

越南国立河内大学教授 阮金山

儒学随着汉字及中国文化早在秦汉（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时期传入越南并开始越南发挥影响力。但在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这段期间，儒学对越南社会的影响不甚明显，几乎仅限于华侨、行政官僚等上层社会范围，而尚未普及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这段期间所出现的出色儒学者及儒学文献并不多。

自从李朝于公元10世纪成立之后，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文明国家，儒学逐步被统治者采用，所以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被儒学思想占领的第一个领域当然就是政治，接着逐步扩展到思想、文教训练、学术著作、文学创作、社会文化、民间风俗等方面。自10世纪至15世纪，儒学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并提升。但是因为佛教此时相当盛行，儒学在三教当中未能取得优势地位，仍与其它两派平分秋色。

自公元15世纪黎朝起，儒学的地位才开始超过佛道两家，成为主体性思想。儒学也逐步渗透到越南社会的各个领域及阶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儒学的影响之下，本来充满东南亚特色的越南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使得越南文化的东亚特色比东南亚特色还要明显。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虽然受到法国的干涉及统治，但是仍然继承并发挥儒学的传统。可以说直到18、19世纪儒学对于越南的社会文化、人民生活、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影响才达到最深刻的程度。越南人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儒学文化及思想逐步本地化的改变，来符合越南本土文化及本地人的个性。此种本地化又丰富了儒学的内容。

越南的儒学经典文献使用两种文字来记载，即汉字与越南的文字——喃字。越南人用汉越读音来念汉字。喃字是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参考汉字造字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标音的方块文字，用来纪录越南语。喃字早在10世纪之前已出现，但目前被认为最早的篇幅较长的喃字著作是出现于13世纪的。在最近7个世纪里，越南人同时使用汉字及喃字两种文字著书立言。虽然喃字的使用没有汉字的多，但是喃字著述也是构成越南儒家典籍文献非常重要的部分。

越南现存的儒学文献仅是越南历代儒者所著述的一小部分。为数不少的儒学文献因为历史的动荡、战争的摧毁、湿热的近热带气候等等因素而遭受坏损、逸失。很多

文献现在仅留下书名，而内容就无从找回，甚为可惜！文献不足的情况对于了解越南儒学的面貌及特色带来许多阻碍及困难。

越南儒学典籍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儒家经典诠释著作；第二，国史、法律、典章制度、礼仪、文教、科举等官方文献；第三，诗赋、散文、小说、记事等文学类著作；第四，风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记载，像家谱、家训、家礼、信函等。

### 1. 儒家经典诠释著作

越南儒家比较注重经世之学，偏向实践，而对于纯理论的研究不太感兴趣。所以越南儒者在儒家经典诠释方面没有多少成就。但是仍有许多儒家，特别是明经博学的儒学者，为了满足政治、文教、科举考试等方面的需求，都著书进行解释、讨论儒家的经典。

朱文安（1292—1370）是第一个著书讨论儒家经典的一位儒学者。他的《四书说约》根据朱注概略地介绍《四书》的内容，这是说明朱子学传入越南的最早证据。14世纪末的胡季犛（1336—1407）也著作一些具有诠释性质的著作，他编《明道》一书针对儒学思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将《诗经》及《尚书·无逸》转译成喃字诗。胡季犛算是头一个将儒家经典转移成喃字诗的人，可视为这种充满越南特色的经典诠释方式的创始人。

儒学在15、16世纪得以有大幅度的发展，但是儒家经典诠释这一类著作的数量仍然不多。直到17、18世纪，此类论述才有突出的发展，许多儒学者都参加解经工作，其最有代表性的儒者有冯克宽、邓太滂、黎贵惇、范阮攸、范贵适、吴时任、裴辉璧等。19世纪曾著书讨论儒家经典的有阮德达、阮文超、阮福洪任（嗣德皇帝）、阮绵窝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有潘佩珠、黎文敏等。

越南汉喃研究院目前所留存的儒学典籍文献总共有1686种，其中涉及讨论、解释《四书》及《五经》的有122种。这些文献使用的文字包括汉字及喃字两种；在体裁方面也包括韵文及散文两大类。在整体看来，此类著作主要讨论一些儒家经典的义理、表达自己对研究儒家经典的心路历程、或者提出自己对经典的见解。也有一些著作以问答的方式进行论述，此类著作基本上是提供给教学及科举考试时用的。这些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够反映越南儒者对于儒学思想的看法、见解及接受方式，同时也显示越南儒者是如何将儒学思想运用到修身治国等实践方面去的。

### 2. 国史、法律、典章制度、文教、科举等官方文献

儒学文化圈诸国的各个封建朝代都非常重视史学，越南的状况也一样，史籍相当的发达。早在越南刚独立之后的李朝、陈朝，一些历史著作已经问世，像《越史略》（佚名）、

黎文休的《史记》。自15世纪以降出现许多卷帙浩繁的书籍，例如由吴士莲及其后代史家相续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由众史家编纂的《史记续编》、《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的历史著作所采用的体裁相当丰富，包括编年史、通鉴、史记、实录、史论、史评、史考等等。现存的史籍书目达到几百部。越南的历史论述基本上遵循儒学的史学思想，历史叙述方式借鉴《春秋》、《史记》的风格，但内容也透露越南人的民族精神，著述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越南本地的政治、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等需求。

法律文献及记载典章制度的著作在汉喃书库里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越南最有名的法律文献就是《国朝刑律》（黎朝洪德律）及《皇越律例》（阮朝法律）。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记载，有《黎朝会典》、《大南会典》、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等。

关于教育、科举考试制度的记载，除了儒家经典及经典的简要介绍、儒家经典入门教材及高级教材、考卷样本之外，还有记载历次科举考试被录取者简历的《登科录》、搜集历次考试的优秀考卷、记载考场规定等文献。此类文献是研究越南儒学教育及科举制度和越南儒学传播史等课题的珍贵原始资料。

### 3. 儒家的文学类文献

文学类文献在越南汉喃典籍文献当中占据最大的比例，虽然尚未进行仔细的统计，但此类著作应该有上千种。因为越南各王朝都取法于中国，透过科举考试“以文取士”制度来选拔人才，所以儒学者都具备文学创作才华及技巧。他们所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及喃字。关于文学体裁，除了采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古体裁，他们还使用越南特有的体裁，这些特有的体裁大部分都出现在喃字文学领域。从文学观念看来，越南儒家基本上遵循儒学的文学规范来创作，特别讲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文学观。依照儒家传统的文学观，越南儒者将文学视为一种服务修身、教化、实施治道、寄托经邦济世的抱负等目的的工具，当然，他们也用诗歌来抒发个人情怀。在儒学思想的笼罩之下，仍可隐约透出作者的民族精神。这类文献也能够集中地反映儒学思想对于越南儒者及越南人的思维模式及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文学类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单独的诗集、文集形式面世，但也有不少儒者进行广泛搜集各家作品编成总集，像黄萃夫的《摘艳诗集》、阮天纵的《群贤赋集》、黎贵惇的《全越诗录》、《皇越文海》、裴辉璧的《皇越诗选》、《皇越文选》等。

### 4. 风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记载

此类文献是属于风俗民情的记载，服务民众日常生活的贴切需求，像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在越南汉喃典籍文献当中占据的比例相当多。此类文献的存在反映儒学思想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普及。此类文献一般来说篇幅较短，且作者、

年代等消息及传承的情况都比较模糊、复杂。越南儒者笔下的汉文本来与中国本土标准文言文在语法及用语方面多多少少有所出入，这种差别在此类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因为此类文献可以反映儒学思想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所以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从总体看来，越南儒学典籍文献源远流长、价值丰富，是越南历代儒者的智慧精髓，是构成越南文化及越南传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就是儒学在越南传播及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儒学在越南本地化的结果。越南儒学典籍文献的存在已经丰富了儒学的面貌，成为全球儒学及东亚儒学的一部份。

## 《儒藏》工程大事记

明朝万历年间孙羽侯首倡编纂《儒藏》之议,提出“隐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稍晚曹学佺亦“尝谓二氏(释、老)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清朝乾隆年间周永年撰《儒藏说》,后乾隆有编修《四库全书》之举,《儒藏》之议暂寝。

20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重倡编纂《儒藏》之议。2002年10月,北京大学接受汤一介先生的建议,决定整合本校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儒藏》工程,并成立北京大学《儒藏》编纂筹备委员会。

2002年11月,北京大学多次邀集校内外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举行《儒藏》工程论证会,张岱年、季羨林先生出席会议给予指导和支持,其间季羨林先生曾给汤一介先生写过三封书信,提出具体建议。

2002年12月,人民日报刊载长篇专访《找回民族力量之所在——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编纂《儒藏》的筹备情况。

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羨林先生为名誉主任、许智宏校长为主任、吴志攀副校长为副主任、汤一介先生为常务副主任的北京大学《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先生、吴志攀副校长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两次邀集校内外学者召开《儒藏》编纂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周密论证,北京大学逐步确立《儒藏》工程基本思路:先编精华编,后编大全本;既要系统编纂儒家典籍,又要对儒家文化作全面研究;文献按四部分类,经校勘、标点,以繁体、直行排印;最终制作成便于检索的电子文本等。

2003年11月,北京大学提交“《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参加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并顺利中标。

2003年1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以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儒藏》工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

2004年4月和8月,北京大学两次召开《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全国(包



括台湾地区) 20 多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与会人士经协商达成合作共识, 并开始签订合作协议。

2004 年 6 月, 经教育部批准,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成立, 汤一介先生任主任, 魏常海先生任常务副主任,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同瑞先生兼任中心副主任, 负责主持《儒藏》工程的日常工作。

2004 年 6 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达通知, 将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精华编”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04 年 9 月,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首度招收的“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方向的研究生入学。

2005 年 8 月, 作为《儒藏》样书的《论语》专集制作完成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此北京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2005 年 11 月, “北京论坛”举办“《儒藏》编纂的世界意义”专题座谈会, 海外学者杜维明、户川芳郎、稻畑耕一郎、黄俊杰、阮金山、蒙曦等对编纂《儒藏》给予高度评价。

2005 年 12 月, 北京大学召开“《儒藏》工程部级负责人工作会议”。

2006 年 4 月, 北京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在上海共同举办“《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协商, 组成以季羨林先生为名誉总编纂, 以汤一介(首席专家)、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先生为总编纂的《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 并聘请饶宗颐先生等 13 位年高德劭的专家学者为顾问。

2006 年 5 月, 《儒藏》精华编编审专家组建立, 孙钦善先生任组长, 成员由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数十位富有经验的编审组成, 专职负责稿件通审和质量把关。

2006 年 6 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公布, 强调在“十一五”期间, 要推进《儒藏》编纂工程。

2006 年 8 月, 汤一介先生访问日本, 与户川芳郎先生会面, 商量《儒藏》精华编收录日本儒学文献事宜。

2006 年 10 月, 孙钦善先生一行访问越南, 与阮金山、丁清孝先生会面, 商量《儒藏》精华编收录越南儒学文献事宜。

2006 年 11 月, 汤一介先生访问韩国, 与柳承国、金忠烈等先生见面, 商量《儒藏》精华编收录韩国儒学文献事宜。

2007 年 4 月,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召开《儒藏》工程编审专家座谈会。

2007 年 5 月, 为庆贺《儒藏》精华编第 104 册(经部四书类论语之属)、第



281册（出土文献类）正式出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儒藏》精华编出版座谈会”，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及学术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有关人士出席座谈会。《儒藏》精华编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引人瞩目。

2007年12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深圳大学文学院在深圳共同举办“《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50余位《儒藏》工程部类主编及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2008年9月，《儒藏》编纂与研究学术评审委员会成立，汤一介先生任主任，李中华先生任副主任，安平秋、孙钦善、余敦康、陈来、陈苏镇、庞朴、张希清、蒙培元、魏常海诸位先生任委员。

2008年9月，汤一介、魏常海先生一行访问韩国成均馆，观礼祭孔大典，并与成均馆、成均馆大学等韩方机构及学者继续商讨合作事宜。

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儒藏》编纂中心和韩国儒教学会共同主办中韩“儒家经籍与诠释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人文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在杭州共同主办“儒学典籍的现代诠释与《儒藏》编纂学术研讨会——2008《儒藏》主编工作会议”，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出席会议。

2008年12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编的学术集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编讫。

2009年1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工程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副司长张东刚，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副校长张国有，以及来自《儒藏》工程合作高校、学术机构的主管校长、科研处长、项目负责人等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汤一介先生“关于《儒藏》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杨光司长发表重要讲话，与会人士就如何加强《儒藏》工作发表了意见。

2009年4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召开“《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邀集中、韩、日、越等国的专家学者，研究协商《儒藏》精华编域外文献的体例、选目、校点及组织工作。

2009年8月，《光明日报》以《〈儒藏〉之境》为题刊载国学专版，发表汤一介（大陆）、饶宗颐（香港）、刘述先（台湾）、汪德迈（法国）、桥本秀美（日本）、阮金山（越

南)等中外学者的专文。

至2009年9月,《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36册,其中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儒学文献各一册,共计2000余万字。另外,由汤一介、李中华先生主持编撰的9卷本《中国儒学史》,由张玉范、沈乃文先生主持编修的《儒藏总目·经部》也即将面世。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胡仲平)